经济学家之路

第五辑

熊诗平　徐　边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之路(第五辑)/熊诗平,徐边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1098-595-7/F·546

Ⅰ.经… Ⅱ.①熊…②徐… Ⅲ.经济学家-人物研究-中国
Ⅳ.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019 号

特约编辑 徐永禄
封面设计 未 名

JINGJIXUEJIA ZHI LU
经济学家之路
(第五辑)

熊诗平 徐 边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0 印张 232 千字
印数:0 001—2 000 定价:23.00 元

编者的话

今天，《经济学家之路》第五辑正式出版并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听取了读者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收入本辑的是有关十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成长经历和学术贡献的作品。他们（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是：方生、刘方棫、汤在新、宋承先、巫宝三、张国赞、张维达、苏东水、杨国昌、蒋硕杰、樊弘。每位经济学家的成长经历就是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他们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的诚实和勇气，从追求光明和批判旧制度、基础理论建设、探索思想渊源、破除陈规旧套、总结历史经验、系统阐发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借鉴国外优秀成果、培育新一代经济学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家的群体优势日益显现，他们经常活跃在中外经济学论坛上，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创造和创新研究，经 20 多年努力求索，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上述十一位学者的生平事迹就是我国经济学家群体优势的生动写照。比如，有的是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先驱者，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对外开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有的是我国消费经济学与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与创始人，在这些领域中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等重要奖项。

又如，有的是主编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的学者，填补了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项空白，阐发了“六册计划”的科学意义，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做出了新的说明；有的是主编国家社科重点项目《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继承与创新》的学者，首次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由来和发展，拓展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更加系统和完整；有的是既通西方经济学又通四卷《资本论》的“双通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相关重要理论融合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给后来经济学人有很多启迪。

再如，有的是中国国民所得理论的开创者，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进入新阶段；有的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其大型学术专著《中国近代史，1840～1894》，是“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标志着经济史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等重要奖项；有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材》新版本的开创者，在课程体系上，打通资本主义两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部分的传统理论框架，按照抽象到具体、本质到现象的逻辑，建立起浑然一体的篇章结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反响，因此，被列入“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

最后，有的是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首创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科学体系，又创“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思想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为中华民族在国际管理学界独树一帜之学派；有的是独战群雄的学者，敢于向西方经济学中的名派名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挑战，严厉批判凯恩斯学派流动偏好货币理论及政策的错误以及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灾难，反对主流学派的货币理论的霸权主义，提出新的“筹资约束”货币理论，以及坚持货币稳定，促进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相关货币政策，从而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有的学者是著名民主教授，发扬先烈革命精神，坚持实行真正的民主，抨击和揭露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在学术上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析凯恩斯错误理论观点，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被毛泽东称赞为“社会科学家”。

本辑内十一篇文稿以丰富的资料描述的经济学家们的生活情况和学术贡献既亲切又动人，并从中阐发的一代宗师与学术泰斗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及科学方法，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广大读者能从中获得激励，刻苦

学习，勇于攀登学术高峰。

《经济学家之路》第一、二、三、四辑出版以来，我们收到不少读者、作者和专家学者的来信、来电和来稿，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编　者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先驱

——方生 …… 桑百川/1

谦谦君子　一代宗师

——记刘方棫教授…… 刘社建/33

汤在新教授: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探索者…… 曾国安/58

既通西方经济学　又通四卷《资本论》

——记著名经济学说史专家宋承先教授…… 陈其人/82

求实与创新相结合的经济学家

——巫宝三 …… 朱家桢/119

中国经济史学家

——张国辉 …… 陈争平/142

我的经济学求索之路 …… 张维达/167

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
——记苏东水教授的学术大师风范 …… 颜世富　陈　静/188
我学习马克思经济学之路 …… 杨国昌/213
蒋硕杰教授的生平和学术 …… 张友仁/232
路漫若求索　治学志弥坚
——记樊弘 …… 龚映杉　王晓东/285

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先驱

——方生

◎ 桑百川

方生(曾用名陈仰鸾、陈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建省连江县人,生于1925年9月9日。他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方生早年就读于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和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1946年考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1947年，参加震惊中外的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1948年，被推举为台湾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站在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斗争的第一线。

1949年初，带领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台湾大学“麦浪歌咏队”做环岛演出，传播大陆的革命爱国歌曲，唤醒了台湾人民的爱国情感，振奋了岛内的民族精神。

1949年3月20日，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离开台湾，在全国学联帮助下，进入华北大学学习。

1949年底，随即将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华北大学师生进京。

1950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至1966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下放江西劳动。

1976年至1977年，借调北京市编书组工作。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在经济学系任教。

1983年9月，出任深圳大学首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

1987年，奉命调回中国人民大学，在经济学系任教，指导研究生，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

2002年4月5日逝世。

方生教授曾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成员，担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高级顾问、三九企业集团战略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方生教授是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先行者，是对外开放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半个世纪以来，方生教授在经济学的园地上，一直执著追求，硕果累累。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勤奋好学，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他具有高度敏锐的理论素养，提出许多超前、创新、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观点，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由于方生教授在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上的卓越贡献和建树，被经济理论界誉为“方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方生教授著述颇丰，发表了大量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先后在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以及联合国机构讲学，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发表自己新的学术观点，对于传播改革理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

几十年来，方生教授一直心系海峡两岸统一，积极参加全国统战工作，对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多次发表文章，抨击“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卑劣行径；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地之间建立“中国经济联合体”的主张；首次提出借鉴台湾在发展经济中的经验；呼吁两岸面向未来，共同振兴中华民族。

方生教授在高等教育战线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

方生教授的简历多次被载入中国和世界名人录。

一、台湾岁月

1946 年 2 月，年仅 20 岁的方生来到台湾，在新竹一家粮食事

务所找到工作，教授台湾省籍职员国语。同年 9 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台湾大学，就读于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在台湾的岁月，是方生投身革命运动的开端。

1946 年 12 月，北京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沈崇事件”。消息传到台北后，激起全市广大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947 年 1 月 9 日，方生和台大、师院等高校学生一起，参加了在新公园召开的万人大会，抗议美军暴行。大会根据与会群众要求，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成立台北市学联；二是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一·九”事件是由台湾本省和外省学生联合发动的一次爱国群众运动，也是台湾光复后，台湾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游行，表达了对国民党当局投靠美国发动内战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对以后台湾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1947 年 2 月 27 日傍晚，国民党政府专卖局缉私人员在台北市延平路殴打女烟贩，并开枪打死一名围观者，激起广大市民的公愤。28 日，市民罢市，游行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取消专卖，抗议游行遭到武装镇压。当日下午，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请愿群众 3 人，打伤 3 人，引发了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方生亲自参加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二·二八”起义，和群众一起，冲击设在新公园的广播电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血腥镇压，并险遭国民党当局毒手。

1948 年，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信、显示出出色组织能力的方生，当选为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后又被推举为首届台湾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起了台湾进步学生运动，站在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斗争第一线。

1949 年初，方生以台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利用寒假时间，带领台湾大学著名的“麦浪歌咏队”做环岛旅行演出。这支由

80 多名台大学生组成的歌咏队，从台北到台中，从日月潭到台南、高雄，一路引吭高歌，把《黄河大合唱》、《祖国大合唱》、《康定情歌》、《农村曲》等大陆的革命爱国歌曲搬上舞台，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唤醒了台湾人民的爱国情感，振奋了岛内的民族精神。方生领导的“麦浪歌咏队”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惧，盯梢的特务尾随歌咏队走完了演出全程。

1949 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台湾政治形势不断恶化。1949 年 4 月初，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自南京抵台，下令清查学运主谋分子，台湾大学生联合会主席方生（陈实）被列为国民党当局通缉学生黑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他处境十分危险，随时有被捕的可能。

国民党当局定于 4 月 6 日，即台大、师院学生预定要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这一天，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这天凌晨，大批军警包围了台湾大学的学生宿舍，大批学生领袖、积极分子和“麦浪歌咏队”成员被捕。警察来到方生的住处，但是，没有找到方生，于是把宿舍的木制地板都撬开了，以为方生躲在地板底下，大有挖地三尺也要抓住方生的劲头。

方生因当时目标太大，身处险境，被迫于 3 月 19 日从基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一艘外国轮船，悄然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离开了他生活、学习、抗争达 3 年之久的宝岛台湾。5 月，方生从香港乘舟北上，在天津塘沽登岸。同舟的还有《资本论》译者之一郭大力，郭沫若夫人于立群，著名作家周而复等。抵达北平后，在全国学联帮助下，方生辗转来到河北保定，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由于他非常欣赏乔冠华在“国统区”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其意是新中国即将诞生，旧统治尚未完全灭亡），遂将原名陈实改为“方生”。从此，一个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展开了他波澜壮阔的

人生画卷，在祖国建设和经济学的园地中书写着人生传奇。

二、步入教坛

在华北大学学习期间，方生曾以学员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了在石家庄市举行的中国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1949年底，方生随即将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华北大学师生进京。进京后，当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主席，出任北京市学联副主席。

在中国人民大学筹备建校过程中，为准备苏联专家来校讲课，方生被选拔进入俄文大队学习俄语。1950年初，圆满完成俄文大队学习计划，调入经济学系。9月，又推选进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攻读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担任经济学教员。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方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兼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组长的职务。他以极大的热情，组织编写教材、学习指导书、参考资料，到各个函授站巡回为学员讲课。在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方生与同事们团结一致，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被评为北京市先进集体。后来，方生又回到经济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方生和许多教员一起赴江西老区参加农村劳动。人大复校后，方生得以重回教坛，继续从事他钟爱的教学科研工作。

几十年风风雨雨，方生教授执著追求，在经济学这块园地上耕耘，桃李满天下，科研成果累累。他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敢于直抒己见，从不人云亦云，表现出一名正直学者的勇气和胆识。他具有高

度敏锐的理论素养，提出许多超前、创新、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观点，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1980 年，方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最早提出不能把城镇个体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我国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同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重要补充。这在当时对于那些轻视个体经济、并推断任何情况下小生产必然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认识，起到了澄清作用。

1983 年，方生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离开商品生产，就没有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就等于是取消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

对于如何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这一涉及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大理论问题，方生多次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反对所谓“单纯自我服务”是重工业发展中的严重弊端的观点，认为只要有社会再生产，重工业就不可能是自我服务的，更不是什么完全自我服务。他提出，我国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地区就适合发展重工业，有的地方则适合发展轻工业、发展农业，笼统地讲“变重为轻”或“变轻为重”，容易造成“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方生与宋涛等 5 位同志一起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全国党政干部基础课自学辅导教材，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央电视台开设系列讲座。这部教材对于经济学界拨乱反正、澄清众多党政干部的模糊认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83 年 9 月，方生教授出任深圳大学副校长，着手创办深圳大学。1987 年以后，奉调返回中国人民大学，在经济学系任教，指导研究生，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

为表彰方生教授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特发给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三、创办深大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汕头、厦门、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一个新的开创性工作落在了方生教授的肩上——受命参与创办深圳大学。

成立不久的深圳经济特区，迫切需要适应特区建设的人才，深圳市政府决定创办深圳大学，并请求中央在组建领导班子上给予支持。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1983 年 7 月，方生教授随同当时任人大副校长的黄达教授和清华大学同仁一起，到深圳做踏荒试点考察。两个星期的时间，摸清了深圳市政府的办学意图，初步确定了建校方针。这年 9 月，方生千里单骑走马上任，出任深圳大学副校长。

草创时期的深圳大学，校址选在靠近蛇口的粤海门，在一平方公里的荒山野岭建校，困难可想而知。首次招收的法律、经济管理、外语、中文、机械几个专业数百名学生，借用原宝安县政府机关的房子上课。方生暂时住在深圳市政府的一幢简易宿舍楼内，每天早晨随便吃些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品就匆匆忙忙赶去上班。中午和晚上都和大家一起在临时校址的露天食堂站着就餐。一年之后，深圳大学的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及一批基础设施相继落成，学校才迁入新址。

在深圳大学期间，方生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当时，深圳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进行改革试验，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实行学分制；

取消助学金，设立奖学金、贷学金；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取消毕业生国家统一分配，实行双向选择，学生自谋职业；创办成人教育学院；实行教师聘任制；等等。这些改革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为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

方教授校务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坚持为本科学生授课，讲授政治经济学、特区经济，为学生开设讲座，并指导硕士研究生，还从事大量社会调研，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如饥似渴地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济特区的实践中汲取营养。

理论来源于实践，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深圳经济特区，可谓培育方生新思想灵苗的一片沃土。在深圳，方教授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大开眼界，从思想上、理论上对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把他的经济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深圳不久，方生注意到人们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心存疑虑。有人担心，外国人凭借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把钱赚走了，我们吃了亏。1984 年，方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利用外资的若干认识问题》的文章，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盲目排外观念，大胆利用外资，以解决我国资金不足这个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问题。为了消灭贫穷落后，“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如果把外资比作水，我们就需要“蓄水池”。1980 年建立的 4 个经济特区就成了最初的“蓄水池”，可以吸引外资源源流入。文章字字句句力透纸背，震耳发聩，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全国引进外资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进入深圳工作之日起，方教授对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和对外开放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撰写了许多关于特区经济方面的文章，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